

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与诗人的社会责任

赵敏俐*

Abstract: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oetr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uniqu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type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ancient China, which is based on the highly developed farming culture, has cultivated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Tian-ren-he-yi*” and further developed the poetic thinking of Chinese. Chinese poetry grasp the world through images, and express the poet’s ideology through a pattern which describes something from nature to society and to life, or conversely, from life to society and finally to nature. “*Emotions stirred by external objects*”, which is the writing mode of Chinese poetry and has practiced in the composition of poems, has proved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universe and their epistemology, “*Tian-ren-he-yi*”. The writing styl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rtistic realm, which is based on *Bi-Xing*, reflect the Chinese aesthetic pursui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ized Nature*”. Chinese believe that the origin of poetry is the emotion which is stirred by the external objects, so the earliest theory of the poetry origin is the concept of *Soul- touching*.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ese poetry is the lyric poetry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describing the ambition. The Chinese poetry history is not only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oems, but also a growth history of Chinese poets. When Chinese appraise poems, the evaluation of a poet is indispensable. The ideological realm and the cultivation of personality of poets are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aspects of evaluating poets. The grade of poetry reflects the quality of the poet, and when you read a poem, you can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 This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when Chinese evaluate poems.

诗歌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学艺术样式，不同的国家对它的理解并不相同，它们也承载着不同的民族传统。“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¹，早在传说中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就开始了诗歌唱。《吴越春秋》里所记载的《弹歌》、《礼记·郊特牲》中的《蜡辞》，《尚书·益稷》中的《赧歌》、《吕氏春秋·音初》里的《侯人歌》，《周易》卦爻辞中的古歌，以及传为尧舜时期的《卿云歌》、《南风歌》、《击壤歌》等等，都是见于记载的上古诗歌。它们有的较为真实可靠，有的带有传闻的性质，还有的可能出于后人的假托，但是却从多个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中国诗歌的早期形态。从形

* 赵敏俐，男，1954年生，文学博士，现为日本广岛大学文学研究科讲席教授，中国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

式上讲，诗歌舞一体是其基本特征；从内容上讲，则涵盖了先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有劳动歌、有祭祀歌、有图腾歌、有战争歌，有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歌、也有表现各种世俗生活的歌。可见，早在上古时代，诗歌就已经成为先民生活的一部分，处处都有诗的歌曲。《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²它用简洁的语言，向我们描述了上古时代一个歌舞狂欢的盛会场景。它说明，中华民族天生就是一个具有诗性气质的民族，诗歌从一开始就承载着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达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之情，这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并开启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诗歌传统。

一、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诗歌传统的形成，与其所生存的独特地理环境和文明起源的类型直接相关。中华民族地处东亚大陆，东南两面环绕大海，西面有喜马拉雅山崛起所形成的天然屏障，北面毗邻的是气候寒冷的东西伯利亚，自然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由此而形成了不同于中亚、北非和欧洲的独立的东亚文明。在这片广阔的大地上，早在 6000—7000 年以前，自南到北就已经出现了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³。这其中，气候湿润温暖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出现了以炎黄为首领的氏族部落，进而建立了以高度的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古代国家。农业文明的起源来自于中国人对于天地运行规律和万物生长规律的掌握，也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因而，中国人没有形成像西方人一样的宗教意识，也没有产生一个像西方基督教那样的上帝。在中国文化中，人的命运一开始就由自己来把握。他们很早就掌握了诗歌这一艺术形式，将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其中，使诗成为表达世俗生活与人生情感的艺术，成为歌颂自我、直面现实的艺术。现存的上古歌谣已经初现此民族特点，至《诗经》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其中有祭祀诗、农事诗、燕飨诗、战争徭役诗、政治美刺诗、婚姻爱情诗、以及表现各种内容的世俗生活诗；举凡念亲、爱国、怀旧、思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均可在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诗人直面自身的现实生活，尽情地抒写着各种情感。自兹以降，由楚辞、汉乐府、魏晋六朝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时调到现当代的新诗，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各少数民族，莫不继承着这一传统。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也是诗歌创作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诗的歌曲；只要关乎人类的生活，就有相应的诗歌创作。诗是中国人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在“诗意中栖居”的民族。

农业社会培养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观，进而培养了中国人的诗性思维。在中国人看来，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按照天的自然法则而生成，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和谐是最佳状态。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自然万物最易触动人的心灵，因而，人类对于宇宙万物的认识，均从观天法地入手，均由万物之象而悟出。《周易·系辞》曰：“圣人以有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⁴这就是中国人的智慧特点和思维方式，通过形象来把握世界，由自然到社会到人生，再从人生到社会到自然。而中国诗歌则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诗性思维特征。其“感物而动”的创作模式及其实践，验证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认识论；以“比兴”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写作手法与艺术境界的营造，体现了中国人以“人化自然”为特征的审美理想追求。因而，这使中国诗歌不仅仅是生活的记录，情感的抒发，还包含了中国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诗意的审美式把握，具有深刻的哲学内容。例如陶渊明本为晋宋时代的著名诗人，但后人却同时把他看成是一位思想家，认为他的诗歌体现了魏晋玄学的最高境界。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优秀的诗篇中总是充满了哲学的内涵，伟大的诗人总是兼具思想家与哲学家的气质。从这一角度来讲，中国诗歌的形式和内容超出了文学与艺术的范畴，它不仅是一部诗歌史，同时也包括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与评价，是一部艺术化了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史。

二、中国诗歌的“言志”传统

中国人生活在这样一个诗的世界，自古就形成了对于诗歌艺术本质的独特理解。中国最早的诗与歌舞合为一体，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诗歌以口传的形式存在，音乐显然是诗义表达的重要载体，因而中国人把诗归之于乐。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中国人认为诗歌起源是人的心灵受外物感动的结果，因此中国人最早的诗歌起源论就是心灵感动说，或者叫做感物说。《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于戚羽旄，谓之乐。”⁵中国诗歌从一开始就直面现实，是心灵的表达，因而中国人很早就提出了“诗言志”的理论，并将“和”作为最高的艺术理想。《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胥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⁶

《尚书·舜典》中提出了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为“诗言志”。何谓“志”？《毛诗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如此说来，“志”包含了人的内心所想的一切。人的内心所想有多么丰富，诗的内容就会有多么丰富。人之所想不仅包括情感，还包括人在社会活动中所获取的所有经验与知识，因而中国早期的诗歌内容也包括这些方面。闻一多将“志”解释为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⁷，并认中

国早期的诗歌有记忆和记录的功能，这不仅可以在汉语诗歌中找到例证，如《商颂·玄鸟》、《诗经·大雅·生民》等诗中关于这两个民族起源的记忆和记录，也可以得到中国少数民族诗歌的证明，如《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等那样的长篇史诗也是如此。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志”这个词语的核心意义还是指人的意志、思想、感情，指的是人对客观社会的认识，亦即人的心灵。因此，几千年的中国诗歌，虽然不乏“记忆”和“记录”的内容，但是其核心却是以抒写“怀抱”为特征的抒情诗。在几千年的汉民族诗歌里，诗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将“记忆”和“记录”溶汇于“怀抱”之中，并形成了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特有风貌。一部中国诗歌史，不仅生动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寄托了中国人美好的生活理想，表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艺术才能，而且还以艺术的方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中国诗歌的文化功能

按今天的观点来看，“诗”属于文学的范畴，或者称之为“语言的艺术”。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国人始终没有把“诗”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而让它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诗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无处不在，它生存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在何种场合需要诗，诗就出现在何处。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采诗献诗之说。《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晋语六》：“在列者献诗使勿兜，风听臚言于市，辨袄祥于谣。”⁸《左传》中则记载了大量的春秋时代诸侯国外交行人赋诗言志之事。《周礼·春官宗伯》：“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⁹可见，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诗经》的采录与编辑，就具有多重的功利目的，可以用于宗教、典礼、教育、听政、讽谏、娱乐等各个方面。孔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¹⁰这说明，孔子也并不把“诗三百”当成纯粹的艺术，同样强调它的各种实用功能。孔颖达曰：“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黷，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¹¹《诗经》题材的多样化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就是其多重功能的最好证明。自兹以后，历朝历代的中國诗歌，莫不继承了这一传统，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昭明太子编《文选》，将诗歌按题材分为“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赠答一”、“赠答二”、“赠答三”、“赠答四”、“行旅上”、“行旅下”、“军戎”、

“郊庙”、“乐府上”、“乐府下”、“挽歌”、“杂歌”、“杂诗上”、“杂诗下”、“杂拟上”、“杂拟下”等二十六卷，按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分类标准颇显杂乱，其实却正好符合当时诗歌创作的状况。这其中，赠答、祖饯、公宴、献诗等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说明诗歌在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社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承担着重要的交际功能。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历代史书中所记载的大量的民歌民谣多用于美刺时政，则说明在普通民众阶层，诗歌仍然扮演着社会批评的重要角色。唐代是中国诗歌最为繁荣的时代，诗歌已经成为唐人生活的一种方式，处处都有诗的存在。人们习惯于以诗歌语言来传达各自思想和情感，除言志、抒怀之外，其它如闻讯、陈情、干谒、请托、公告等社会活动，都可以通过诗的形式完成，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广泛。宋代以降，这种情况继续发展，诗人还用它来进行美刺、说理、交际、应酬、消遣、娱乐乃至炫耀才学。迄至现代，学习和创作传统诗歌，依然是表现中国人文化修养水平的重要方式。中国诗歌的这一特点，在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当中也有鲜明的表现，诗歌同样在审美、抒情、教育、传授、刺政、择偶、娱乐和交往等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又兼具多种功能，这构成了中国诗歌鲜明的民族特色。因为它是抒情的艺术，诗情生发于人的心中，“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汉书·艺文志》），所以它有强大的生命力，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因为它具有多种实用功能，和现实生活紧密相联，“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所以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生活于现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随时都可以听到诗歌唱。因此，要认识中国诗歌，就要了解中国人的情感、生活、风俗、习惯，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在中国文化中，诗是艺术，是心灵的历史，也是生活的万花筒，社会的百科全书；它有艺术审美的价值，更有认识社会的价值；它有感召人心的力量，更有生活教育的力量。

四、中国诗人的社会责任

在中国诗歌史上，诗人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因为诗人是诗歌的创作主体，而且还因为中国人有着崇高的诗歌理想追求。中国人将诗的发生视为心灵对外物的感动，承认每个人都有可以成为诗人的天性，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心灵感发都可以成为优美的诗章，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礼记·乐记》曰：“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¹²因此，一个人如果要创作出好的诗歌，就一定要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有高尚的道德追求。这对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

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¹³诗歌艺术的极致，应该是人类美好德性的外在优美显现，只有如此才能称得上是“乐”，才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只有通过诗人不断地净化心灵，然后才能在他的创作中实现。中国古代诗人与外国诗人和现代诗人不同，还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在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主体是文人，而文人的入生理想则是辅助圣君达到天下大治的贤臣，因而中国的诗人总是自觉地担当着崇高的社会责任，具有圣人的情怀。刘勰《文心雕龙》讲为文之枢纽是“原道”、“征圣”与“宗经”，这里“原道”讲的是对文学艺术本质的体认，“征圣”是向圣人学习，而“宗经”则是以圣人的文章为法。在这里，核心是“征圣”。一个人必须具有圣人的情怀，他才能真正的体道，才能够做到“文以载道”，写出好的诗文。在中国历史上，道德上的圣人是尧舜，文化上的圣人是孔子，诗中的圣人是杜甫。杜甫之所以被后人尊为“诗圣”，诗歌艺术技巧的高超固然是其重要的方面，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他具有一颗忧国忧民的胸怀，有民胞物与的精神，这是他所以创作出好诗的根本。他不仅为后世诗人树立了诗歌创作的榜样，还树立了做人的楷模。

所以，一部中国诗歌史，不仅是诗歌作品发展的历史，同时还是一部中国诗人成长的历史。中国人评价诗歌从来就离不开评价诗人，把诗人的思想境界与人格修养放在重要方面。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誉，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絮，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絮，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汗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¹⁴在汉人看来，屈原的《离骚》之所以写的好，是因为它包含了那么丰富的历史、文化、思想内容，其艺术水平又是那么高超，与屈原崇高的社会理想与高尚的人格节操密不可分。正因为《离骚》是屈原创用血泪凝结而成的生命之歌，因而才能达到“与日月争光”的高度。诗品即人品，诗如其人，这是中国人评价诗歌的一条重要原则。

作为以“言志”为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歌，自然也处处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与文化理想，体现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例如《诗经》中形成的“风雅”传统，在《离骚》中所展现的香草美人形象与美政理想，在汉代骚体抒情诗中所表现的怀才不遇与生不逢时之感，在建安诗歌中所形成的慷慨悲凉风骨，在陶渊明诗歌中所寄托的隐逸之怀与田园情趣，在盛唐边塞诗中所抒写的建功立业之志，在李白诗中所张扬的个性气质，在杜甫诗歌中所展现的忧国忧民情怀，在苏东坡诗歌中所体现的儒道禅思想的融合与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无不体现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生活价值观念。后世诗人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创作主张，如江西诗派的以才学为诗，明代前后

七子的倡导复古，公安派与性灵派推崇性灵诗学，同样寄托了他们的文化理想。至如清初遗民诗里所抒写的国亡家破之痛，黄遵宪、王国维、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穆旦等近现代著名诗人的诗歌名篇，更向我们展现了中国诗人博大的胸怀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展示了中国古典诗歌走向现代过程中所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精神，表达了他们对诗歌这一文学样式的特殊体认。因此，不了解中国的诗人，我们便无法了解中国诗歌。一部中国诗歌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诗人的心灵史和思想史。

注

- 1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78页。
- 2 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284页。
- 3 河姆渡文化以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而命名，持续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并在其中发现了7000年之前的人工栽培稻。仰韶文化以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命名，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红山文化因最早发现于内蒙赤峰市而命名，以后在辽河流域有多处发现。存在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三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别出现于中国的南方、中原和北方，说明中华大地早在6—7千年左右均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
- 4 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9页。
- 5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7页。
- 6 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同上引，第117页。按：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舜典》不会是舜时的著作，而是后人根据传闻所做的追记。但即便如此，它的产生最晚也当在战国前期，仍然是中国早期重要的诗歌理论文献，是对此前中国人的诗乐观的总结，代表了中国人早期对诗乐本质的认识。
- 7 见闻一多《歌与诗》，《闻一多全集》第10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页。
- 8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第11页、387—388页。
- 9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787、796页。
- 10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2525页。
- 11 孔颖达：《毛诗正义序》，同上引，第261页。
- 12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第1529页。
- 13 同上引，第1536页。
- 14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2482页。